

论

元和诗论

诗



诗

论

● 曾广开 著 ● 辽海出版社

元和诗论

曾广开 著

辽海出版社

1997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和诗论/曾广开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7. 5

ISBN 7-80638-004-3

I. 元… II. 曾… III. 唐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7209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90 千字 印张: 8

印数: 1—500 册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于景祥 谢 丹 责任校对: 丹 阳

封面设计: 刘冰宇 版式设计: 张秀俊

定价: 12.50 元

导 言

这部书要研究的是唐代元和时期的诗歌。

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共十五年（806—820）。但本文所谓“元和时期”，大体上包括元和以前的贞元和永贞时代以及元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具体地说，它是指唐德宗贞元十年（794）至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之间共三十五年的时间。为叙述方便计，我们把这段时间称之为“元和时期”。

我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课题，主要是基于这样两点：其一，元和时期名家辈出，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如双峰并峙，各呈异彩，刘禹锡、柳宗元、张籍、王建又为之羽翼，可说是开元以后唐诗又一繁荣时期。其二，元和时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发生剧变的转折点。因此，研究元和时期的诗歌创作，追寻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演化的轨迹，对于唐诗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我认为元和时期是唐诗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主要是依据《全唐诗》现存元和时期诗歌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谈丛三》曰：“唐至开元而海内称盛，盛而乱，乱而复。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莲、少陵，后有昌黎、香山，皆当时鸣盛者也。”近人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中推衍其说云：“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佑也。”事实也真是如此，元和时期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其诗人之众多，其创作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包括盛唐在内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收录诗人397人，而

元和时期驰誉诗坛的诗人就有 60 余人⁽¹⁾。《全唐诗》(包括外编、辑佚)现存诗 5 万余首,元和时期诗人的制作约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尽管这一时期没有造就出李白杜甫那样横绝百代的大诗人,但名家辈出,韩愈、孟郊、张籍、王建、李贺、贾岛、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诗歌成就丝毫不亚于盛唐李杜以下诸人,其影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白居易的出现,跻身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伟大作家的行列,与其他元和诗人一道,把杜甫所开辟的诗歌道路拓得更宽更远。

更值得注意的是,元和时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一个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发生剧变的时代。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卷七曰:“诗至贞元、元和,古今一大变。”叶燮则更明确地指出:“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之‘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唐之所独,后千百年无不从是而断。”⁽²⁾元和时期,无论就社会历史来说,还是就文化学术来说,均可视为唐代前后历史分期的一个界标⁽³⁾。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和文人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诗到元和体变新”⁽⁴⁾,元和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与开宝、大历时期迥然不同的风貌。特别是元和时期所形成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情趣不仅仅是直接影响了晚唐的诗歌,而且进一步影响和制约了宋元明清数代诗歌的发展方向。元和时期,韩孟元白等人用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富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创作,推动并完成了诗歌发展史上的变革。从此,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开始沿着韩孟元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韩孟元白诸人的诗歌成就,当时就受到很高的评价。从古

迄今，研究元和时期诗歌的著述十分丰富，其中不乏精辟、系统的论述。面对前人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还有无必要重新对元和时期的诗歌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那么，在这难乎为继的研究领域中，应该选择什么角度来进行我们的研究呢？

我们知道，元和时期诗歌的主流，集中表现为韩孟、元白两大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韩孟、元白两派的特点和差异，历来是研究元和时期诗歌创作的热点，因为理解了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的差异，就基本上把握了元和时期诗歌发展的规律。自宋代起，研究者无不重视元和诸诗人差异所在。如宋人蔡绦曰：“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为苏小虽美，终带风尘。……韩退之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疏与。”⁽⁵⁾宋人张戒亦曰：“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事为工。然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耳。”⁽⁶⁾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评汇》三集录前人评语，概述韩孟元白诸人风格，尤为精当：“韩吏部歌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掣电，挟于天地之垠”（司空图）；“孟郊诗思苦奇涩，有理致”（刘昫）；“张籍祖《国风》，宗汉乐府，思难辞易。王建似张籍，古少今多”（陈绎曾）；“浪仙诚有警句，观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寒涩，方可致才”（司空图）；“李贺辞尚奇诡”（刘昫）；“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东坡）；“刘禹锡诗以意为主，有气骨”（吟谱）。今人于韩孟元白诸人之研究论述更是举不胜举，但其所论仍着重于韩孟元白诸人诗歌风格及差异，其论点也多是据前人所言加以推衍而已。

由于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的风格迥异，较难找到他们之间

有多少一致的地方。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元和时期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加强对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的研究，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而寻求元和时期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演化的轨迹。这就需要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探讨，不但求其异，也应求其同，更准确全面地揭示元和时期诗歌发展的规律。我认为：韩孟元白等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尽管由于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文学素养不同，性格不同和艺术情趣不同等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其诗歌风格迥异，这是很自然的。但由于他们身受同一时代的价值观念的制约，受当时的社会风习、道德的影响，他们的诗歌创作，必然也会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我相信在同一文化背景中产生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歌流派必然有许多共同点，在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的同时，寻求研究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将把这一研究课题大大推进一步。

由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所决定，我在研究中采用了多种方法。

（一）文史哲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学术研究的治学方法，向来就有文史哲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本文将这一方法做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为我们运用这一方法提供了范本。他在论及如何考察元稹的“艳情及悼亡诗”时指出：“故于一当日社会风习道德观念。二微之本身及其家族在当日社会所处之地位。三当日风习道德二事影响及于微之之行为者。必先明其梗概，然后始可了解。”⁽⁷⁾陈氏所论，也可以说是我们研究某一古代作家及作品的具体可行的通则。

（二）批评和考据相结合。在考据的基础上进行批评，是程千帆师根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提出的。我们知道，文学

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本身。研究古代的诗歌，首先必须应用各种知识阐释其字句，阐明其义蕴，这是考据的基本内容；另外，依据论世知人之旨，需要对作家的身世、生平、婚姻、交游以及作品的背景等进行考辨，然后上升为批评。“如果将它们完全割裂开来，也会使无论是考证还是批评的工作受到限制和损害。”“虽然对具体的人来说，不妨有所侧重。”⁽⁸⁾本文虽然侧重于批评，但为了避免“批评流于空洞”，将努力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

（三）社会学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统一。本文的重点在于“论”，必然要对元和时期的诗歌创作进行价值评判，这就要求本文必须采用文艺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来考察元和时期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但是，研究诗歌单凭冷静的理性加以评判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作者的心灵”，“否则，尽管你大放厥词，却搔不到痒处。”⁽⁹⁾所以，本文将努力把社会学的批评与审美的批评结合起来，力求准确地传达出作品所蕴含的审美情趣。

（四）文艺心理学和其他研究方法。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人们观察社会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丰富。文学艺术的研究，也要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作家创作时的心理活动，研究当时的社会深层心理。同时，为了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考察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也需要借鉴其他研究方法，开拓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元和时期的社会政治及影响”；第二章为“元和时期的社会风气及影响”；第三章为“元和时期的文学思想”；第四章为“元和时期的乐府诗”；第五章“论元和体”。

【注释】

(1) 据《唐才子传》，活动在元和时期的诗人有：王建、武元衡、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刘言史、刘商、卢仝、马异、刘叉、李贺、李涉、朱昼、贾岛、庄南杰、张碧、朱放、羊士谔、姚系、鲍信陵、张登、令狐楚、杨巨源、马逢、陈羽、刘禹锡、孟郊、张仲素、吕温、张籍、雍裕之、权德舆、长孙佐辅、杨衡、白居易、元稹、李绅、鲍溶、张又新、殷尧藩、清塞、无可、熊孺登、李约、沈亚之、徐凝、裴夷直、薛涛、姚合、李廓、章孝标、施肩吾、袁不约、韩湘、韦楚老、张祜、朱庆馀等。

(2) 叶燮《唐百家诗序》，见《已畦集》卷八。

(3) 陈寅恪《论韩愈》：“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见《金明馆丛稿初编》。

(4) 白居易《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见《白居易集》卷二三。

(5) 蔡绦《蔡百衲诗评》，见《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6)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7)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八一页。

(8) 程千帆师《詹詹录》，见《闲堂文藪》。

(9) 程千帆师《詹詹录》，见《闲堂文藪》。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元和时期的社会政治及影响	1
第一节 “中兴”的梦想与现实的困惑	1
一、社会的暂时安定与元和诗人的政治理想	1
二、永贞革新对元和诗人的影响	5
第二节 元和“中兴”	8
一、裴贲集团的政治改革及其对元和诗人的影响	8
二、裴贲集团的失势分化及白居易“吏隐”思想的发展	12
三、元和“中兴”与社会危机的加剧	18
第三节 梦幻的破灭	22
一、唐室对局势的完全失控与“中兴”之梦的破灭	22
二、白居易“吏隐”思想对元和诗人的影响	26
第二章 元和时期的社会风习及影响	36
第一节 崇尚进士科的风习及影响	36
一、崇尚进士科风习的形成	36
二、文人在科举中的交游是文人集团形成的基础之一	38
三、进士行卷对元和诗风的影响	42
四、进士科考试对元和诗风的影响	46
第二节 文人入幕的风气及影响	50

一、文人入幕风气的形成	50
二、文人在幕府中的交游是文人集团形成的 基础之一	51
三、文人入幕风气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56
第三节 元和时期文人的婚姻及其影响	60
一、崇尚门第婚姻观的变化	60
二、文人的婚姻集团是文人集团形成的基 础之一	64
三、元和诗人的婚姻生活和爱情生活	66
四、元和时期文人的婚姻、爱情对诗歌 创作的影响	71
第三章 元和时期的文学思想	80
第一节 元和时期的功利主义的诗歌主张	80
一、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	80
二、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主张	86
三、元白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主张	92
第二节 不平则鸣	104
一、韩孟诗派的“不平则鸣”的诗歌主张	104
二、“不平则鸣”说对元白诗派的影响	110
第三节 元和时期诗歌的通俗化倾向	113
一、元和时期诗歌通俗化的原因	113
二、元和时期诗歌通俗化对元和诗风的影响	117
第四章 元和时期的乐府诗	132
第一节 乐府诗源流	132
第二节 元和时期乐府诗研究的几个问题	136
一、乐府诗的主体由民歌完全过渡到文人的创作	136
二、“新题乐府”与“新乐府”	138

三、元和时期的乐府诗是否入乐·····	141
四、“新乐府运动”是否存在·····	144
第三节 元和诗人对旧题乐府的模拟和拓展·····	146
第四节 元和时期的新题乐府诗·····	152
一、元和时期新题乐府的思想内容与历史价值·····	152
二、元和时期新题乐府诗的艺术特征·····	163
第五章 论“元和体” ·····	173
第一节 “元和体”概说·····	173
第二节 “元和体”中的五言古体讽谕诗·····	182
一、为什么说韩孟元白的五言古体讽谕诗属于 “元和体”·····	182
二、韩孟诗派的五言古体讽谕诗·····	186
三、元白诗派的五言古体讽谕诗·····	192
第三节 元白诗派的五言长篇排律·····	200
一、元白诗派的五言长篇排律的思想内容·····	200
二、元白诗派的五言长篇排律的表现方法·····	205
第四节 “元和体”中“杯酒光景间”的“小碎 篇章”·····	208
一、“元和体”中“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 的形式·····	208
二、“元和体”中七言绝句的审美趣味·····	210
三、韩孟诗派“杯酒光景间”的小诗的成就·····	212
四、元白诗派“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	216
参考书目举要 ·····	231
后 记 ·····	240

第一章 元和时期的社会政治及影响

每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该时期的社会现实政治,无疑对该时期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影响,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元和诗人,都曾积极参与元和时期的政治斗争。现实社会的政治,对他们的思想、仕途进退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他们的人生理想、政治主张以及仕宦经历中的喜怒哀乐,自觉不自觉地必然要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之中。因此,考察元和时期诗歌的规律,首先要考察元和时期的社会政治及其对诗人的影响。

第一节 “中兴”的梦想与现实的困惑

一、社会的暂时安定与元和诗人的政治理想

安史之乱的爆发,将唐王室推向衰亡的深渊。肃代两朝经过千辛万苦,唐王室才摆脱死亡的威胁,获得暂时安定。德宗即位,向往开元盛世,也想整顿政治,励精图治。德宗曾罢诸处岁贡及减宫中服御常贡;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放四方鹰犬;罢内出孟兰盆,不命僧为内道场,且诏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王府六品以上官及诸州县有司可并省及诸官可减者,量事并省;整顿军事,约束宦官,朝政为之一新。但是,由于德宗为人忌刻,重用奸邪小人,对河北诸镇锐意讨伐,不能量力而行,知进不知退,致使建中、兴元年间兵祸连天,社稷安而复危。幸赖群臣效命,河北诸镇又非齐心谋叛,这才相继平

定朱泚、李怀光的叛乱，渐渐稳定住局势。贞元初年，虽说国家表面安静，但中、晚唐的三大弊政——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朝臣朋党的局面已经不可控制。德宗对宦官、藩镇更是一味姑息，国家衰微之征兆愈来愈明显。特别是连年用兵，国家财用匮乏，加上天灾并行，关中饥馑，朝廷为推行两税法，多用理财聚敛之臣，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贞元十年（794），德宗贬去陆贄，以裴延龄为相，减官收其俸禄以实帑藏，进一步褒奖“进奉”聚敛的地方官吏，又以中官为宫市使，名为宫市，实际上是对百姓进行强取豪夺。虽说此时国家表面上平静无事，实际上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面对如此的现实，元和诗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贞元年间，韩愈、孟郊、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渐次登上仕途，他们虽然生长于战乱动荡的岁月，但盛唐的景象还依然存于人们的记忆中，他们对民生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对社会现实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尽管他们也有着济世救民的宏愿，羡慕盛唐诗人的功业和成就，但现实的黑暗，特别是现实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激烈使他们的仕进态度和心理发生了变化，他们只能用与盛唐、大历诗人不同的眼光去看待现实。他们再也没有盛唐诗人那种希望立功边陲、建立不世功业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慷慨激昂地以功业、英雄自许的自信心，但他们却更清醒，懂得如何培养自己从政从军的才干，小心谨慎地利用每一次可以升迁的机会，四处求人援引，希望能够到达一个理想的位置，切实地为解除民生痛苦干一番事业。同时，他们面对残酷和变幻无常的政治现实，对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有着更深的忧虑，“兼济”和“独善”的两难抉择开始困扰他们的思绪和感情，从而影响着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

研究古代文人的仕进和归隐，很多人习惯于这样一种模式

化的解释，误以为古代文人仕途顺利时便思“兼济”，仕途受到挫折便思“独善”，逃向老庄。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古代文人的仕进和归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时代政治的影响最为直接。对元和诗人来说，尽管他们进退各异，但他们在贞元年间的仕进心态有许多相同之处，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韩愈、孟郊二人，在贞元年间就显现出不同的仕宦前途，但二人的人生道路抉择却面临着相同的两难困境。

孟郊是元和诗人中的年长者，他四十五岁时才考取进士。贞元十六年（800），他近五十岁时，才获得溧阳尉这样一个小官。孟郊出身贫寒，多次应举，备受行役、羁旅之苦，其生活之窘迫，往往见诸于歌诗。其《赠崔纯亮》诗云：“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¹⁾，这种忧愤感情的抒发，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情绪的发泄，实际上是许许多多的下层文人对仕途无望的哭诉。由于仕途蹇顿，孟郊比元和时期其他诗人更早地感受到时代的感伤气息，他十分不喜欢这种“鞭挞黎庶”⁽²⁾的县尉职务。据《新唐书》卷一七六《孟郊传》所述，“（溧阳）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积水。郊间往坐水傍，徘徊赋诗，而曹务多废。令白府请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事实上，孟郊不是因课诗而废曹务，而是不愿以尉职俗吏之事而污其行。其《溧阳秋霁》一诗流露出他对官场的不满和对县尉这种下僚职务的失望：“旧识半零落，前心骤相乖。饱泉亦恐醉，惕官肃如霁。上客处华地，下寮宅枯崖。叩高占生物，齟齬回难谐。”⁽³⁾在这种愤世嫉俗的思想影响下，孟郊不久便挂印而去，归隐田园。然而，这种隐居生活又与他早年汲汲所求的事业功名相矛盾，他对于仕宦和归隐二事颇难抉择，其《乙酉岁舍弟扶侍归义兴庄居后独止舍待替人诗》又叙述了他辞官后的贫困和心情的痛苦：“谁言旧居止，主人忽成客。僮仆强与

言，相惧终脉脉。出亦何所求，入亦何所索。饮食迷精粗，衣裳失宽窄。回风卷闲簾，新月生空壁。士有百役身，官无一姓宅。丈夫耻自饰，衰鬓从飒白。兰交早已谢，榆景徒相迫。惟予中心镜，不语光历历。”⁽⁴⁾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情难以消除，加上生活的没有着落，元和初年，孟郊又去投奔河南尹郑馀庆，重新奔走于仕途。

和孟郊相比，韩愈虽然也曾有过被贬蛮荒的经历，但还是比较顺利的。贞元八年（792），韩愈进士及第，成为名相陆贽的门生。尽管陆贽罢相后韩愈也曾数次没能通过吏部的考试，但他从贞元十二年（796）起，相继入汴州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中和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幕中任推官，深受幕主的器重。不久，入朝为国子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803），时韩愈为监察御史，因关中天旱年荒，韩愈为民请命，上书请宽民徭并免其田租，因此得罪了幸臣李实，被贬为连州阳山令。”⁽⁵⁾韩愈在阳山颇有政绩，“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⁶⁾可见，贬居阳山之前，韩愈两度从军，又值心高气盛的少年，特别是身居监察御史的要职，更是前途似锦。在这种情况下，他本不该有消极退隐思想，可是，现实社会的黑暗，官场的倾轧，使他对仕途充满了忧虑和恐惧，其早年所做的《忽忽》和《从仕》等诗，一再流露出感时伤逝、思慕归隐的思想：“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死生哀乐两相弃，是非得失付闲人。”⁽⁷⁾“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黄昏归私室，惆怅起叹音。弃置人间世，古来非独今。”⁽⁸⁾诗中喟叹出仕和隐居“两事皆害性”，思欲弃去“死生哀乐”、“是非得失”，可以明显地看到韩愈早年所受《庄子》的影响。当然，贬居阳山，会进一步促使韩愈接受老庄思想。贞元十九年（803）以后，韩愈常

常感叹富贵无常：“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经常用老庄“贵柔”、“齐物”的思想告诫自己：“自从齿牙缺，始慕舌为柔。因疾鼻又塞，渐能等薰莸。深思罢官去，毕命依松楸。”⁽⁹⁾当元和初年韩愈被召回朝廷时，他并没有流露出“兼济”的渴望，而是流露出更浓郁的归隐思想：“追思南渡时，鱼腹甘所葬。严程追风帆，劈箭入高浪。颠沈在须臾，忠鲠谁复谅？生还真可喜，克己自惩创。庶从今日后，粗识得与丧，事多改前好，趣有获新尚。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细君知蚕织，稚子已能饷。行当挂其冠，生死君一访。”⁽¹⁰⁾我们知道，盛唐诗人的归隐，有许多是求仕的手段，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元和诗人的隐居，虽然带有一种怅望，但大都是诚心诚意的。所以，尽管韩愈本人贞元年间并未选择归隐，但韩愈所体验的仕进与归隐间的两难抉择却一直困惑着整个元和时期的诗人的心灵。

贞元年间，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元稹、张籍等诗人也相继登进士第，进入仕途，刘禹锡、柳宗元和韩愈一样，贞元十九年（803），亦已仕至监察御史，他们的仕宦热情较韩愈、孟郊更高，满怀着济世的热望，只有等到永贞、元和以后，他们面对经济凋敝、宦官擅权、藩镇骄横的现实，才逐渐意识到盛唐的繁华如梦一般逝去，再也难以寻觅。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经常流露出对盛唐的怀恋和对时事的感伤，即使有时是在抒发远大的志向，应该用激昂的声调，也难免夹杂着一种哀怨的感伤。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他们时常为仕进和归隐的两难取舍而感到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他们自认为合适的人生道路。

二、永贞革新对元和诗人的影响

社会经济的凋敝，政治的腐败，早已引起统治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革新图强。永贞元年